

王沃、王石定父子的漁業事業探討

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 吳菁萍

摘要

打狗（今高雄）早期即有漁業的發展，從萬丹、旗後、東港等一帶皆為漁業重鎮，其中旗後以季節性烏魚最為著名，在早期有季節性漁民前往捕撈，後來出現常態性漁民定居，形成漁業聚落，日本統治初期仍維持漁業活動。及至 1900 年代，旗後、哨船頭所形成的打狗港域，由於機能性的不同，小船、舢舨往來輪渡，持續至打狗港進行疏濬與第一期築港工程有了變化。

王沃本籍在東港，也是傳統漁業重地之一，東港漁業活動不輸旗後地區，緣何王沃及其家人於明治 37 年（1904）間選擇離開東港、移居旗後？日本於 1910 年，將動力化漁船帶進臺灣，而後透過漁業移民，將動力漁船帶進打狗，隨著海陸聯運的哈瑪星建構完成，哈瑪星成為日本人經營漁業的根據地，在這樣的情況下，王沃及其長男王石定建立了臺灣出身人士的漁業版圖，並掌握現代化漁業發展的契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南部重要的漁業家族。

關鍵詞：王沃、王石定、漁業、遠洋漁業

本文改寫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許家彰建築師事務所執行之「歷史建築『王沃、王石定故居』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歷史研究部分，該計畫參與人員有主持人許家彰，共同主持人李文環，協同主持人陳坤毅、黃朝煌，史學研究吳菁萍。本文架構方向由李文環教授提供發想。

投稿日期：2024 年 2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24 年 3 月 29 日

Discussion on the Fishery Career of Wang Wo and Wang Shih-Ting

Ching-Ping Wu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ishery industry in Kaohsiung developed quite early until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en it underwent new changes. Wang Wo and his father decided to leave Donggang and come to Cijin in 1904.

In 1910, Japan brought motorized fishing boats to Taiwa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masen, Hamasen became a base for Japanese fishery perations. Wang Wo and Wang Shih-Ting grasped the opportunities of modernized fishing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ishing family in southern Taiwan.

Keywords: Wang Wo, Wang Shih-Ting, Fishery, Pelagic Fisheries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 壹、前言
- 貳、打狗港的吸引——從東港到打狗
- 參、王沃漁業事業的崛起
- 肆、王石定的事業版圖
- 伍、結語

壹、前言

王沃、王石定父子在日治時期南部漁業版圖中，具有相當的分量，而王氏父子的漁業事業，得力於打狗港的發展與哈瑪星的崛起。

打狗（今高雄）從早期即是漁業中心，從萬丹、旗後、中洲、紅毛港、西溪、東港等一帶皆為漁業重鎮，¹ 相關研究如張守真《旗津漁業風華》說明打狗、旗津、旗後的由來，而旗後聚落的形成則與漁民捕捉烏魚密切相關，並描述旗後在不同時期的漁業發展；² 陳美純的〈打狗旗後地區漁業發展之研究〉，內容提到從荷治到日治時期，旗後一直是重要的漁業重心，也是高雄最早發展出聚落的地區，而日治時期引進的動力漁船、漁具，更是讓漁業範圍擴大與漁獲量增加；³ 王淑珍的〈旗後舢舨船與地區發展之研究〉，內容則提到舢舨船工具，隨著旗後的發展，其功能先是捕魚的漁船，而後具有急難救助、接駁、轉運、引導和運輸等功能的船隻，透過舢舨船功能轉變過程來了解旗後地方發展。⁴

及至 1910 年代後，緊鄰港區的新興市街崛起，即哈瑪星，範圍包括的新濱町一二丁目、湊町五個丁目等，後於大正 7 年（1918）取代哨船頭、旗後，成為地方行政中心。關於打狗新興市街哈瑪星的研究著作相當豐富，例如：李文環等人的《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敘述哈瑪星是日治時期人為建造出的港埠新興市街，連結了鐵路與山海，並進一步分析哈瑪星的土地形成、產業、人口等結構；⁵ 李文環〈蚵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則是論述日治時期蚵寮移民來到哈瑪星，從事漁工、苦力等漁業相關職

1 「旗後、萬丹，水利能生三倍；大林蒲漁家錯落，而東港、西溪採捕不下千戶。」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0。

2 張守真，《旗津漁業風華》（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0）。

3 陳美純，〈打狗旗後地區漁業發展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4 王淑珍，〈旗後舢舨船與地區發展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5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臺中：好讀，2015）。

業，並與代天宮的信仰與組織間的關係。⁶另外，黃于津的〈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說明日治時期在「哈瑪星」興築的現代化漁港與兩座魚市場間的關係，並探討在魚市場設置後，對於哈瑪星區域內的空間使用、產業型態的影響。⁷

港區的漁業中心、商業中心，由哨船頭、旗後轉移至新興市街哈瑪星之際，打狗港第一期築港計畫修築的哨船頭船渠（即今第一船渠），成為打狗港漁業船隻的聚集地，成為漁業及魚貨交易所在地，而第一代的高雄魚市場便設於湊町，直至昭和 4 年（1929）高雄魚市場搬遷至新濱町二丁目 10 番地。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探討王沃、王石定父子，在這樣的背景下，緣何掌握先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南部重要的漁業實業家。

貳、打狗港的吸引——從東港到打狗

王沃為何會來到打狗旗後，首先需了解 19 世紀下半葉東港的發展情況，以及釐清王沃的父親王水與家族的實際情形。



一、東港地區的極盛時期

清帝國時期臺灣開港通商後的東港地區發展情況，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探險者來到臺灣的見聞紀錄中得知。例如：1875 年 1 月下旬，⁸ 俄國海軍軍官艾比斯（Pavel Ivanovich Ibis）來到臺灣南部旅行，⁹ 目的地是瑯嶠（今恆春），並在李庥牧師的陪同下

6 李文環，〈蚵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40（2016），頁 21-44。

7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高雄文獻》，10（2）（2020），頁 76-107。

8 同治 13 年（1875）1 月 12 日清帝國皇帝駕崩，同年 1 月 16 日確認使用「光緒」年號，惟新任皇帝於 2 月 25 日登基，因而在這僅使用西元年。

9 保羅·艾比斯（Paul Ibis），又譯名保羅·伊比斯，出生於愛沙尼亞，家鄉後來被併入到俄羅斯帝國，就讀帝國海軍基地克隆施塔（Kronstadt）的航海學校，名字俄羅斯化成帕維爾·伊凡諾維奇·艾比斯（Pavel Ivanovich Ibis），畢業後於海軍服役，並隨護衛艦阿斯考德號（Askolda）進行環球航行，1874 年底護衛艦停靠香港期間，艾比斯決定到臺灣進行調查，於 1875 年 1 月搭乘澳大利亞船隻 Pelham 號前往打狗。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著，林金源、劉怡宏翻譯，《福爾摩沙拾遺：歐美的台灣初體驗 1622-1895》（臺北：經典雜誌，2019），頁 251。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頁 156。

曾於打狗、¹⁰ 東港一帶短暫停留。艾比斯記錄了東港有二萬居民，其中三分之一人口以漁業維生，捕魚工作相當盛行，風平浪靜時可以看到數以百計的戎克船（junk）、竹筏（catamarans）遍布海面，而岸邊上千的漁民則忙著清洗、裝箱、鹽醃、曬乾各種魚貨，幾里外都可以聞到這裡的魚腥味，而魚貨則銷售至打狗、臺灣府城（今臺南），以及廈門、汕頭。¹¹ 光緒元年（1875）6月，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從打狗到南岬（今鵝鑾鼻）勘察的過程中，途經東港，看到東港約有 28 艘戎克船停泊河邊，正在裝卸貨物，其中幾艘裝滿鳳梨預計轉運到廈門、香港及其他地區，河岸則有六、七千人居住，畢齊禮認為東港是戎克船轉運的大貿易地。¹²

光緒 8 年（1882）克萊因瓦奇特（George Kleinwächter）在南岬到打狗的旅途中探查並談論福爾摩沙南部的地質，包含海灣與港口，克萊因瓦奇特觀察到東港位於戎克船可航行的河口，與清帝國間往來航行貿易，成為戎克船貿易中心，也是重要的市場，因而認為東港可能會成為福爾摩沙南部最適合出口貿易的港口。¹³ 從外國探險者的紀錄中，可以看到 1880 年代的東港，除了漁業興盛外，商業貿易也具有一定規模，看起來東港地區的發展前景似乎相當良好，但王水與王沃實際上卻是在日治初期選擇到打狗發展。

根據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王水出生於咸豐 11 年（1861），父親是王溪、母親是潘氏田，居住在阿猴廳港東中里東港街 461 番戶，家族在東港從事漁業。王水於光緒 8 年（1882）繼父親王溪之後成為新戶主，一樣從事漁業；其他位在港東中里東港街的居民，例如：王大頭、王壽、王樂等人，¹⁴ 在戶籍資料中職業顯示為漁業，透過戶籍資料，可以知道東港居民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仍以漁業作為日常事業，而王水於明治 37 年（1904）

10 Pavel Ivanovich Ibis 著，江杰翰、吳進仁、劉柏賢、陳韻聿譯，《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國海軍保羅·伊比斯的臺灣調查》（新北：聯經，2022），頁 51。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著，《福爾摩沙拾遺：歐美的台灣初體驗 1622-1895》，頁 251。

11 艾比斯在 1876 年出版的俄文版文章寫到東港有四分之三人口從事捕魚，1877 年出版的德文版則寫東港有三分之一人口從事漁業。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54、168。

12 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是英國人，從事工程師職業，也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1875 年來到臺灣，並和清帝國官員周有基到今鵝鑾鼻進行燈塔用地的探勘。劉克襄，《福爾摩沙大旅行》（臺北：玉山社，2015），頁 194、201。

13 克萊因瓦奇特（George Kleinwächter）是德國人，1879 年跟隨其兄入海關工作，工作地點位於清帝國海關，後於 1882 年被海關總署派往福爾摩沙南部調查地質，時值海關在南岬建造鵝鑾鼻燈塔，或許是為配合燈塔工程而來進行地質調查。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250、264。

14 王大頭、王壽、王樂等人出現在港東中里東港街 867 番地的地籍資料中，此筆土地明治 42 年（1909）登記為建地，由王大頭、王壽持有，而後王大頭持分土地於明治 45 年（1912）賣給居住在臺南廳大竹里打狗旗後 399 番地的王沃；王壽持分土地於大正 6 年（1917）賣給陳熙，陳熙持分於大正 8 年（1919）賣給來自日本宮城縣從事代書業的水越定吉，而水越定吉將所持土地於大正 11 年（1922）賣給王樂。資料來源：屏東縣東港戶政事務所之戶籍資料。

選擇帶著長子王沃移居旗後，從 1880 至 1900 年代，東港與打狗旗後分別有什麼因素影響王家的選擇？

二、日治初期東港、旗後的漁業資源

明治 30 年（1897）間，臺灣總督府曾對今日的高屏地區進行調查，由鳳山縣屬三好義孝奉命調查打狗附近漁村與東港一帶的漁業，調查內容包括：漁戶、漁船、漁網及漁具、漁獲等方面的數量統計，做成「復命書」，即「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¹⁵之報告。

復命書內容以今高屏沿海漁村作為單位，總計調查 36 個漁村，觀察其中東港、旗後庄的統計資料，整理如表 1。

表 1 1897 年間東港、旗後庄之漁業調查統計表

地點	漁戶人數	專業戶數	漁筏數 (總價)	漁具數 (總價)	漁獲量 (總價)	水產製造物 (總價)
東港	612 人	54 戶	40 (1,200 圓)	108 (4,850 圓)	1,422,000 斤* (59,710,000 圓)	240 斤 (384,000 圓)
旗後庄	836 人	149 戶	175 (3,140 圓)	227 (7,755 圓)	475,000 斤** (15,826,000 圓)	540 斤 (1,008,000 圓)

* 東港漁獲種類包括：烏魚290,000斤、加納魚30,000斤、魚品仔魚30,000斤、白帶魚20,000斤、慟仔魚15,000斤、粗皮沙13,000斤、蝦13,000斤、土魷魚12,000斤、羹仔魚12,000斤、批刀魚10,000斤、加網魚10,000斤、双过沙6,000斤、魷魚6,000斤、祈魚3,000斤、青唯魚2,000斤、麻甲魚600斤、鐵甲魚600斤、花連魚600斤、狗母魚600斤、花身魚400斤、烏格魚200斤。

** 旗後庄漁獲有烏魚1,140,000斤、臭魚156,000斤、皮刀魚70,000斤、沙魚40,000斤、文鯧魚16,000斤。

資料來源：「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年8月1日），〈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

根據統計表，在漁戶人數方面，東港漁民雖然多過旗後庄，不過就專業戶每戶平均人數來說，旗後庄每戶 11.3 人、東港每戶 5.6 人，旗後庄遠高於東港，顯示當時旗後庄的漁業已經出現以僱傭關係專門從事捕魚工作，而非傳統家庭漁戶為主。在漁船方面，

¹⁵ 「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年8月1日），〈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

旗後庄的漁船數目不比東港多，但是旗後庄的漁船單價高於東港。在漁具的造價總額方面，雖然東港是高於旗後庄，不過在所捕的漁獲量來看，以旗後庄的表現亮眼，尤其漁獲量總價當中，以烏魚的捕獲量及利潤占絕大多數，而東港的魚群種類雖然豐富，但漁獲量及總價遠低於旗後庄，不過東港的水產製造物則比旗後庄的興盛。

透過調查統計，我們可以知道 1890 年代末期東港與旗後庄的漁業狀況，就調查結果而言，旗後庄的漁戶專業戶比例高，且獲利相當可觀的漁獲是烏魚，相較來說，東港則維持傳統漁家方式進行捕魚事業。換句話說，旗後漁場的捕魚利潤高於東港漁場，且旗後在烏魚的量與產值遠遠超過東港，可說是具有明顯捕烏魚的專業度。而當時漁業者的戶籍有好幾家出現大量從事漁業的寄留人口，加上王水於明治 37 年（1904）寄留旗後街 246 番地的資料，顯示王水從東港移居旗後街從事自己擅長的漁業，並受僱於旗後街的漁業專業戶。

三、打狗港域的發展

明治 33 年（1900），王石鵬在《臺灣三字經》提到：「打狗港，大鹹湖，安全地，可無虞（打狗港有一大鹹湖，深僅七尋，然西南海岸惟此為一安全港）。」¹⁶ 以及「漁業盛，海岸西……（臺灣漁業，西海沿岸自安平至打狗之地最盛……）」¹⁷ 由此顯示打狗港是臺灣南部重要的安全港及漁業港之一，缺點則是港灣較淺且易泥沙淤積。¹⁸ 港灣淺雖然對漁業來說似乎影響不大，但是就貿易進出口而言，則是會產生船隻航行的問題，尤其打狗港又有暗礁分布的問題。¹⁹

早在打狗港開港通商之際，由於商船貿易日增，外國商人曾向清帝國建議疏濬、清淤打狗港，但清帝國並不重視相關建議，²⁰ 雖有外國商人出資改善，²¹ 不過仍然無法解決打狗港淤積的問題，在大船無法順利進出打狗港的狀況下，位於打狗港外緣的

16 王石鵬，《臺灣三字經》（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9。

17 同上註，頁 23。

18 同上註，頁 29。

19 打狗港灣是狹長水域，深度約 1 公尺，只有少部分水域深度達 3 公尺，且寬約 60 公尺的航道中間有礁石，港外則有堤狀沙洲，不適合大型船隻航行或停泊。楊玉姿，《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頁 52。

20 財團法人臺灣省台南社會教育基金會編，《認識南臺灣系列專題講座專輯（第二輯）》（臺南：臺灣省立台南社會教育館，1995），頁 41。

21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志港灣篇》（高雄：高雄市文獻會，1958），頁 14。

旗後成為停泊船隻的地方，並運用竹筏及舢舨船作為接駁轉運的工具，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日治初期。明治 30 年（1897）伊能嘉矩的日記提到：「旗後街在打狗街的對岸，旗後街和打狗街把打狗灣擁抱著，形成打狗港。……到達旗後，投宿於『打狗館』旅館。……打狗港的熱鬧市街就在旗後。」²²顯示旗後街發展繁盛，吸引許多人前來旗後居住，而為了滿足居住在旗後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又有更多的人來旗後開設商店，除了食衣住行之外，休閒娛樂也是重要的消費，這些商店的興起為旗後帶來繁榮情景，對於往返旗後街、打狗街的人群而言，竹筏與舢舨船則是方便搭乘的交通工具。

這樣的情況持續到打狗港進行疏濬與第一期築港工程，臺灣總督府選擇打狗港而非東港作為築港對象，某種程度上是基於明治 35 年（1902）正式使用機械化生產的橋仔頭製糖所，以及明治 41 年（1908 年）臺灣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其中縱貫鐵路南端的終點設置在打狗停車場，在陸運轉海運的交通運輸上，打狗港成為重要的輸出入港口，需要解決淤積及暗礁問題，因而逐步進行港灣建設工程。



參、王沃漁業事業的崛起

光緒 15 年（1889）7 月 13 日王沃於東港出生，父親王水、母親陳氏好，有一姊姊王氏梅，²³而王家的本籍居住在阿猴廳港東中里東港街 461 番地。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明治 37 年（1904）間，年約 15 歲的王沃跟隨父親從東港移居旗後，父親王水的職業在東港即從事漁業，王水在旗後的住所記錄是「大竹里旗後街 246 番地寄留」，而旗後又是專業漁戶聚集之地，換言之，王水可能是受僱於專業漁戶的漁民，推測其在旗後進行專業漁業捕撈。

22 根據內容提到旗後街在打狗街的對岸、旗後街和打狗街把打狗灣擁抱著，以及 1895 年「打狗附近地形圖」所標註打狗、旗後的位置，打狗街可能位在哨船頭附近。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上）》（臺北：遠流，1996），頁 288。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25 日。網址：<https://gi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

23 戶籍資料記錄王氏梅於明治 19 年（1886）11 月 20 日出生，由吳王氏梅的名字登記與居住地記事，推測王氏梅與吳姓人家結親後曾居住於大林蒲。資料來源：高雄市鼓山戶政事務所之戶籍資料。



圖 1 日治初期發行之旗後街明信片

圖片來源：發行人不詳（年代不詳），〈日治初期旗後街〉。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11.009.029。

一、王沃初到旗後

根據後代訪談，王沃少年時期在旗後從事舢舨工作，在當時旗後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商店林立、商業相當繁盛，有些打狗街的人群會至旗後街工作或交遊，舢舨業有旗後至哨船頭、旗後至苓雅寮、旗後至打狗停車場等航線，²⁴ 這些小型船隻除了接駁貨物，亦可輪渡載人。²⁵ 父親王水從事捕魚工作，少年王沃則利用小船輪渡載人，在工作期間，搭船的客人有些會贈送魚隻給王沃，不過王沃也捨不得食用而是轉售魚隻，即零售雜魚。此外，為了增加收入，王沃在工作之餘也會幫人刷洗船隻。²⁶ 王沃從舢舨工作轉變為經營漁業，或許與日益競爭的輪渡行業有關。明治 40 年（1907）鐵道部埋立完成，利用浚渫港道的泥砂填海造陸，作為車站、鐵路、碼頭、倉庫等用地，鐵道部將土地出租，海陸運輸相關產業以及生活需求產業讓此塊陸地逐漸形成聚落，帶動人潮進入，形成新濱街，成為哈瑪星發展的起點。²⁷ 往來旗後、哨船頭、濱線與倉庫群的人群漸多，除了原本的舢舨輪渡外，日本業者也看到相關商機。明治 40 年（1907），日本人松田從內

24 〈打狗舢舨組合〉，《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1 年 3 月 5 日），第 2 版。

25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頁 150。

26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237。

27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21），頁 65-66。

地引進總噸 13 噸的小型石油發動機船 2 艘作為渡輪，雖然松田的渡輪事業不甚順利，但此舉開啟了日人在打狗港從事專業旅客渡輪的事業。²⁸ 同一時間，旗後地區從事運貨載客的舢板船約有數百艘之多，由港區的臺籍渡船業者構成，王沃當時屬於其中一員，不過隨著競爭者日多，王沃開始思考職業後續發展。明治 41 年（1908）王沃曾轉寄留至旗後街另一處地址，戶籍資料亦記錄王沃的職業標示是漁業，推測王沃在累積一些財富後，或租賃、或購買船隻，做起捕魚生意。《臺灣人士鑑》記錄了王沃於明治 42 年（1909）開始販售鮮魚批發，²⁹ 而戶籍資料也記載王水之子張都在明治 42 年（1909）受僱成為王沃家僱人。張都是王沃的弟弟，出生於明治 28 年（1895）8 月 6 日，曾居住在大林蒲，雖然是王沃家出養給張姓人家成為螟蛉子，但與哥哥王沃的感情甚好。³⁰ 張都在戶籍資料上的職業是浚渫船水夫，當時正值打狗港進行第一期築港工程，³¹ 推測王沃家亦有參與築港浚渫工事。

二、從旗後到哈瑪星

王沃除了鮮魚販售外，在明治 43 年（1910）兼營帆船漁業，並從大正元年（1912）開始使用機械動力漁船進行漁業工作。³² 機械動力船由日本漁業移民帶入，而日本漁業移民進入打狗地區，除了打狗第一期築港工程的完善，也跟地方政府認為打狗港漁業具有發展潛力相關，選擇在打狗支廳前的沿運河岸一帶（哨船頭運河東岸的湊町一帶）新築魚市場，³³ 於大正元年（1912）11 月落成，即打狗魚市場，³⁴ 並介入漁業批發通路，³⁵ 魚

28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頁 150-151。

29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40。

30 資料來源：高雄市鼓山戶政事務所之戶籍資料。

31 打狗港第一期築港計畫於 1908 年 4 月帝國議會通過計畫審議，進行疏浚、開鑿、興建現代化港埠等工程，疏浚部分涵蓋清除港嘴岩礁與港門外淺洲，並增加港口深度及廣度，整體工程於明治 45 年（1912）完成。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打狗築港》（臺北：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1912），頁 9-10。

32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頁 40。

33 〈計設魚市〉，《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 年 4 月 20 日），第 4 版。

34 〈魚市落成〉，《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 年 11 月 22 日），第 6 版。

35 漁業大致可分為生產、批發與零售三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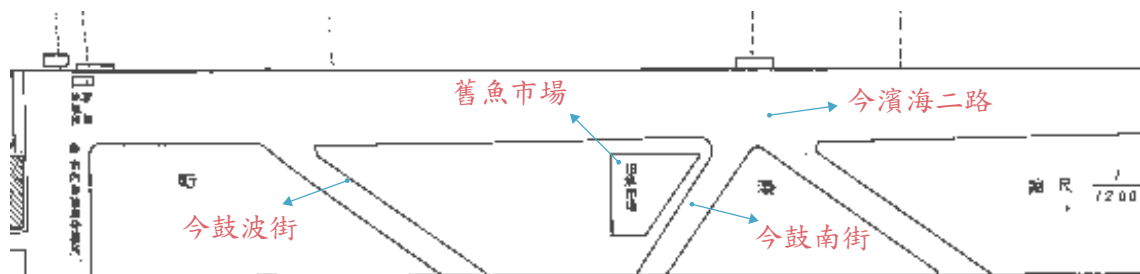


圖 2 舊魚市場的位置（局部）

圖片來源：日高六太郎發行、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臺南新報社高雄印刷所，1930），附圖。圖示為李文環套繪。

市場由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負責經營。³⁶

王沃所在的旗後是打狗地區漁業發展相對發達的地方，推測在旗後從事漁業相關工作的王沃，因而接觸了現代化的捕魚技術，並在短短幾年時間內，進一步採用機動



圖 3 高雄港第一船渠鄰近漁市場，船渠中可見各式船舶，如小型動力船、舢舨船及竹筏等

圖片來源：謝惠民（1968），〈1968 年高雄港第一船渠〉。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2.008.080。

船進行捕撈。機動船與現代化的捕魚技術提高了漁獲數量，捕撈到的漁獲原本是傳統市場就近販售模式，因為打狗魚市場的設置，轉變為停靠在船渠由魚市場進行販售，而魚市場則位在新興市街哈瑪星的湊町，於是大正 8 年（1919）王沃遷居湊町，成立了丸山商號。³⁷在此時期，王沃逐步將漁業事業發展起來，根據後代的訪談，

³⁶ 明治 44 年（1911）8 月，由楨哲、安藤達二、荒井泰治、藤崎三郎助、安部幸兵衛、川崎榮助、青地玄三郎等人共同發起創辦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安藤達二擔任社長，會社經營漁撈、水產製造、養魚、魚市場以及海陸產物買賣等事業。「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設立二付官有地拂下并官租地復舊工事設計及工事著手結了期間認可（社長安藤達二）」，〈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一三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1912 年 12 月 1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24006，頁 77-82。

³⁷ 漢珍數位圖書，《臺灣人物誌》。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9 日。網址：<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ShowService?&path=ftimg/&title=c98/9827901.pdf>。

王沃曾與蔡文賓（又名蔡文彬）合作，王沃出一半資金、蔡家出四分之一，加上其他人一起出資，事業逐漸發展出規模後，王家與蔡家便分開經營捕魚事業。

1920 年代動力漁船的使用發展迅速，大正 9 年（1920）年底的發動機船約 27 艘，到了大正 14 年（1925）年底，高雄已有 160 多艘發動機船，漁獲量也隨之顯著增加。³⁸ 為了加強漁業生產管理，高雄州政府在大正 13 年（1924）《水產會法》及其施行細則頒布後，同年成立高雄州水產會，水產會具有公法人機關性質，³⁹ 並將民間自行聚合的「漁業組合」，⁴⁰ 轉變為有法令依據的社團法人。⁴¹ 大正 14 年（1925）由日人成立「旗後漁業組合」，⁴² 同年 11 月成立「中洲漁業組合」於高雄市中洲 33-1 番地。⁴³

除了生產階段外，日本人進一步強化批發階段的管理，大正 15 年（1926）間，正值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經營漁市場的契約期滿，⁴⁴ 經過一番討論後，將魚市場的經營權交給高雄州水產會接手，負責漁港陸上設備與漁船管理。至於魚市場的販賣業務，⁴⁵ 以高雄州水產會代理機構的身分成立「高雄魚市株式會社」來負責處理，⁴⁶ 其組成有漁業從業者與魚商，共同出資者包括：日商高橋傳吉、杉本音吉、楠田金之丞，以及臺籍漁商王沃、陳光燦、潘致祥等人，⁴⁷ 管轄湊町魚市場與旗後分場，事務所則設置在魚市場內。

「高雄魚市株式會社」成立選任董事之際，由高雄市三浦碌郎知事指名高橋傳吉、

38 〈當面の急務たゝ高雄漁港設置問題（上）〉，《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6 年 7 月 16 日），第 2 版。

39 胡興華，〈臺灣漁會的演變與發展〉，《檔案季刊》，13（1）（2014），頁 9。

40 高雄民間受到影響的漁業組合是「有限責任中洲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前身為大正 6 年（1917）8 月 7 日創立的「中洲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在 1924 年後改組為「有限責任興業信用組合」，參與者有林迦、黃慶雲、胡知頭、李炳森、黃德明、李忠麟、黃盤銘、楊金虎、莊媽江、張啟華、蔡聯丁、顏阿緣、楊延慶、黃平、馮課、彭雲長、周加六、黃朝聰、曾貢生、郭森源、朱清琳、楊春安等人，戰後由林瓊瑤擔任興業信用組合組合長，後改名為「保證責任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歷史沿革〉。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5 日。網址：<https://www.kh3c.com.tw/kh3cintro/history.html>。

41 鄭力軒，〈重修屏東縣志：產業型態與經濟生活〉（屏東：屏東縣政府，2014），頁 23。

42 一說「旗後漁業組合」位於湊町四丁目，另一位於高雄市平和町一丁目六番地。王御風，〈日治時期高雄造船工業發展初探〉，《高雄文獻》，2（1）（2011），頁 67。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收於高雄州產業調查會編，《高雄州產業調查會委員名簿》（高雄：高雄州，1936），頁 356。

43 王御風，〈日治時期高雄造船工業發展初探〉，頁 67。

44 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在打狗魚市場的經營並不順利，主因是私營魚市場抽取的傭金偏高，時有押金、魚價、中間人數等不公平的聲音傳出，加上外部硬體環境也面臨挑戰，會社對於魚市場的經營態度並不積極，契約到期並無續約的意願。〈打狗魚市改善漁民之福音〉，《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8 年 3 月 1 日），第 6 版。日高六太郎發行、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臺南新報社高雄印刷所，1930），頁 1-3。

45 〈高雄魚市代行機關特殊會社の内容漁業者保護に意を用ゐ關係業者の氣受は好い〉，《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6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46 佐久間馨儀、吳佩儒，〈大坪與一翁小傳〉，《高雄文獻》，2（2）（2012），頁 175。

47 王御風，〈日治時期高雄造船工業發展初探〉，頁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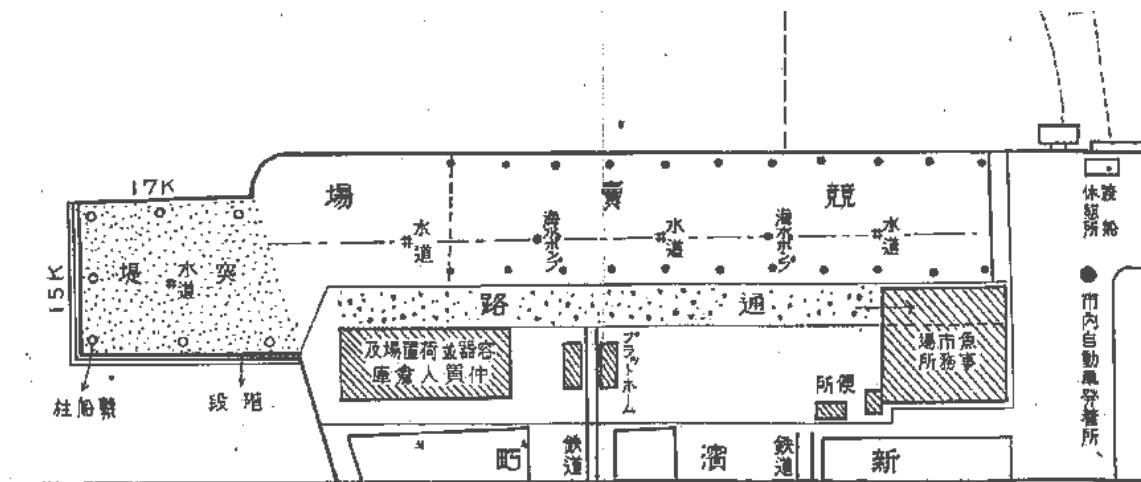


圖 4 魚市場配置平面圖

圖片來源：日高六太郎發行、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附圖。

山田福太郎、日高六太郎、王沃等人擔任高雄魚市株式會社董事，⁴⁸顯示王沃在漁業領域的表現活躍且頗具知名度。此外，王沃於昭和 2 年（1927）籌設漁具船具等設備購買組合擔任監事，⁴⁹對照戶籍資料，與王沃的職業在昭和 2 年（1927）位於湊町魚市場相符。現代化的捕魚設備，除了動力漁船之外，配合新式漁法，需購置相對應的漁網漁具，這些設備均來自於日本的技術。

有鑑於動力漁船的數量與噸位快速遞增，高雄港尚未提供動力漁船在給水、給油、給冰，以及魚貨卸賣、漁產加工等作業需求的專業魚港，漁業從業者持續發起修築高雄漁港的請求，第一期漁港修築工事於昭和 2 年（1927）7 月動工、昭和 3 年（1928）3 月完工；⁵⁰另外，增設的陸上設備，包括：新設魚市場拍賣場、魚市場事務所與倉庫等，並於昭和 4 年（1929）完工，其中新設的魚市場即座落於新濱町二丁目 10 番地，⁵¹在此前王沃則是在湊町魚市場經營「丸山」。⁵²

48 〈高雄魚市重役選任〉，《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6 年 3 月 11 日），第 4 版。

49 〈高雄市漁組籌設購組〉，《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 年 8 月 7 日），第 4 版。

50 日高六太郎發行、作者不詳，《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頁 3。

51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頁 89。

52 原幹次郎，《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頁 241。

三、經營遠洋事業

1930 年代，南進政策受到日本方面矚目，許多海洋探測船也在此時期前往南洋進行漁場探測與試驗，高雄漁港是相當重要的基地，試驗船因而選擇從高雄出發或返歸回高雄，在地的漁業從業者也會搭乘或受邀參與試驗船航行。昭和 11 年（1936）間，聯合相關從業人員在高雄州成立高雄漁業協同組合，將漁場擴及南洋、菲律賓群島等，以完成日本水產南進的目標，王沃也參與其中，成為理事之一，⁵³並受頒水產功勞者表彰銀杯一座。⁵⁴

王沃經營遠洋漁業，前後共有機械動力漁船 30 餘艘。根據 1937 年《臺灣に於け

表 2 日治時期王沃擁有的動力漁船表

船名	總噸數	無線電	馬力	機關製造所	進水年月	漁業種類
第十五金祥丸	58.45	有	100	山陽	1928.11	延繩
第十三金祥丸	15.79	有	25	阪神	1933.07	延繩
第十六金祥丸	19.94	無	30	木下	1933.07	延繩
第十八金祥丸	19.84	有	30	木下	1933.08	延繩
第二十金祥丸	17.66	無	25	阪神	1933.11	延繩
第二十一金祥丸	17.66	無	25	阪神	1933.11	延繩
第十金祥丸	19.78	有	30	臼杵	1933.12	採貝
第二十三金祥丸	19.97	有	30	木下	1933.12	延繩
第二十五金祥丸	19.99	有	30	木下	1934.09	延繩
第二十六金祥丸	19.98	無	30	木下	1934.10	延繩
第三十金祥丸	19.97	有	25	木下	1934.12	延繩
第二金祥丸	19.97	有	30	不詳	1934.12	延繩
第二十八金祥丸	19.99	有	30	木下	1934.12	延繩
第三十一金祥丸	72.98	有	100	木下	1935.11	延繩
第三十八金祥丸	19.59	有	9	神戸赤	1936.10	延繩
第一金祥丸	13.85	無	20	不詳	1936.02	延繩
第三十六金祥丸	18.81	無	9	神戸赤	1936.07	延繩
第三十二金祥丸	19.35	無	9	神戸赤	1936.07	延繩
第三金祥丸	64.26	有	90	阪神	不詳	採貝

說明：船隻表格有網底的船種為汽船。

資料來源：臺灣水產會，〈臺灣に於ける動力付漁船々名録〉（出版地不詳，1937），頁32-43。

53 高雄州，〈高雄州産業調査會水產部資料〉，頁 349-356。

54 臺灣水產協會，〈彙報・高雄に於ける水產功勞者表彰〉，《臺灣水產協會雜誌》，252（1936），頁 33。

る動力付漁船々名録》の動力漁船記載，臺籍漁商中，以王沃の動力漁船，計有 19 艘，又總噸數為最多，計有 580.99 噸，蔡文賓の動力漁船，計有 16 艘，擁有 384.5 噸，可見王沃是高雄臺籍人士中擁有最多動力漁船與總噸數最多之漁商。進一步檢視王沃所有的船隻噸數，以第三金祥丸、第十五金祥丸、第三十一金祥丸の船隻屬於汽船且噸數高，⁵⁵ 雖然不及日本水產株式會社，不過日本水產主要是經營鮪魚、捕鯨方面的遠洋漁業，而王沃則是延繩、採貝等漁業種類皆有涉略，由此可知，王沃の遠洋漁業事業，在高雄、甚至於南部水產界，是相當重要的人物。

此外，由於經營遠洋漁業需要大量冰塊，根據王沃後代訪談，回憶當時家裡船隻出海捕魚，通常出航時間會為三個星期至一個月，在出發之前船隻會載著一個月所需之冰量，冰在當時可說是漁船遠航時漁獲保存相當重要的關鍵，需求量相當高，王沃也投資製冰產業，擔任高雄製冰株式會社董事職務。⁵⁶ 在經營事業有成的情況下，王沃



圖 5 歷史建築王沃故居中王沃銅像

圖片來源：2020 年 9 月 6 日，吳菁萍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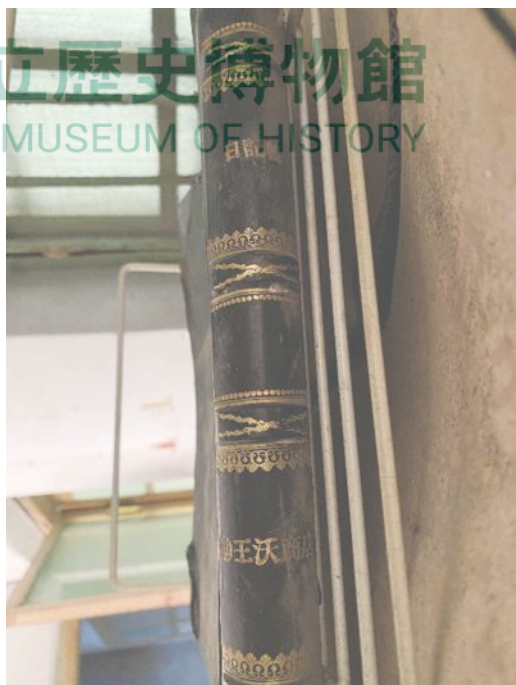


圖 6 王家後代保留王沃商店日記帳本

圖片來源：2020 年 9 月 6 日，吳菁萍拍攝。

⁵⁵ 臺灣水產會，〈臺灣に於ける動力付漁船々名録〉（出版地不詳，1937），頁 32-43。

⁵⁶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頁 40。

興建位於湊町三丁目 26 番地之宅邸，具有住家、辦公、員工宿舍需求等用途的三層樓建築。根據訪談，一樓是辦公大廳，處理關於跑船回報等事務，並設有接待室用來討論事務；二樓是起居室，後方設有船長休息室，並提供住宿；三樓是戶主休息、辦公的地方，若有交好的貴客亦可使用三樓空間來接待。

皇民化運動進行時，王沃曾改名為丸山隆沃。⁵⁷ 王沃因事業與當局關係友好，在昭和 12 年（1937）舉辦的高雄港祭中，為了表揚漁業從事者對高雄的貢獻，王沃是其中的一員，由市長松尾繁治頒發表彰狀及銀製竹筏。⁵⁸ 而王沃的漁業事業也讓王沃在當時被譽為南部水產界的第一人。⁵⁹

王沃於昭和 18 年（1943）因病過世，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籍知名人士的婚喪喜慶多採用日式儀式，王沃的葬禮受此影響，採取日本式的殯葬儀式，並於南禪寺舉行。⁶⁰ 王沃過世後，其事業版圖交由長子王石定接手經營。

肆、王石定的事業版圖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大正 2 年（1913）10 月 20 日王石定出生於旗後，是王沃長子。王石定先後就讀打狗公學校（今旗津國小）、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今高雄中學），在中學教育完成之際，王沃希望王石定先接手家族事業，不過王石定的學業相當優秀，在學校老師與家長溝通，以及王石定的意願下，王石定前往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商學部，還未畢業時已和林淑媛小姐結婚，⁶¹ 生下長女王麗雪。王石定在東京所需的學費、生活費，取自於王沃事業在東京的經銷商，而王石定投資眼光獨到，根據鳳山地政的紀錄，王石定曾於昭和 10 年

57 惟《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一書，介紹王石定的文章中，稱王沃為丸山隆次，其他書籍、報導對王沃的稱呼多為丸山隆沃。臺灣水產協會，〈彙報・臺灣水產輸移出入組合創立〉，《臺灣水產協會雜誌》，318（1941），頁 41。漢珍數位圖書，〈臺灣人物誌資料庫〉。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9 日。網址：<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ShowService?&path=ftimg&title=c98/9827901.pdf>。

58 〈高雄港祭 盛況閉幕 有龍舟競渡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7 年 3 月 31 日），第 4 版。

59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頁 40。

60 南禪寺屬曹洞宗派，位於高雄市湊町 3-1，明治 45 年（1912）4 月，住持為梅田瑞巖、加藤寄運。〈丸山隆沃氏〉，《高雄新報》日刊（1943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闕正宗，〈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古今論衡》，8（2002），頁 67。

61 林淑媛為楠仔坑庄長林土城之女，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之中學，在臺灣與王石定結婚後，隨著王石定一起到日本，並於日本新娘學校學習。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38。

(1935) 購買戲獅甲庄 505 番的土地，當時投資戲獅甲土地的尚有林瓊瑤、林迦物產株式會社，這些土地於昭和 11 年 (1936) 因應戲獅甲工業區的需要，由高雄州政府收購。⁶²

王石定於昭和 12 年 (1937) 3 月畢業回臺。返臺後，王沃因為身體健康因素，將事業交由王石定接手，公司的事務也由王石定處理，而王家的住所是兼具辦公、起居功能，時常有人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出入王家商談。王石定由於在日本留學，相當熟諳日語，除了日常工作，在住所起居室後半部設有船長休息室，而日治戶籍資料也顯示，在湊町 3 丁目 25、26 番地，有日本籍船長、漁業從業員曾在此居住的紀錄。根據王石定長女的回憶，家中常有人來找父親王石定談事情，且多以日語交談，王石定也會在三樓榻榻米空間，以壽喜燒、清酒等宴請朋友；此外，王石定長女就讀湊國民學校（按原為日本子弟高雄市第一小學校），⁶³ 而學校的教職員生多為日本人，其身邊多是日本人之同學朋友，並提到父親王石定的船隻回來後，會將鮪魚送給學校的校長、師長，由此推測王石定與日本漁業從業者及日本官員有一定相熟程度。

遠洋漁業在船隻出海後，因為在國外或其他地區沒有基地，漁獲不能在當地出售，需要將漁獲載回臺灣銷售，整體作業時間需三、四個月，而王石定經營遠洋事業時，透過交際人脈網絡，公司的業務發展比之前更好，擁有第十福祥丸、⁶⁴ 第二金祥丸等三十多艘漁船，⁶⁵ 也組成需兩艘漁船合作的拖網漁船，成為當時臺灣第一隊。

除了遠洋事業的經營外，王家也經營魚塢事業，此事業的開端是王沃運用漁船所賺來的資金置辦，在臺南、麻豆、岡山等地擁有魚塢，與朋友合夥經營管理。魚塢是用來養殖虱目魚，而虱目魚可供人食用，也是使用延繩釣捕獲鮪魚的餌料，⁶⁶ 後來魚塢事業亦由王石定接手經營。

王石定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改名丸山定彥，曾參與各種漁業經營相關的職位，例如：

62 收錄於《重工業用地買收書類（戲獅甲、前鎮）》，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20.019.0080-0180、KH2020.019.0080-0182。

63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第三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377。

64 「船舶登錄（十一月）」（1939 年 12 月 22 日），〈昭和 14 年 12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3765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765a006。

65 「船舶登錄（三月）」（1940 年 5 月 5 日），〈昭和 15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3877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877a007。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38。

66 王御風，〈日治時期高雄造船工業發展初探〉，頁 67。

昭和13年(1938)曾在嘉義魚市株式會社擔任董事，並於昭和14年(1939)南進海運株式會社在高雄成立時，擔任董事一職；⁶⁷另外在昭和15年(1940)擔任高雄水產會議員，以及株式會社民報商事社負責審計監督之職務。昭和16年(1941)亦擔任高雄水產加工業會社董事、皇民奉公會高雄市支會奉公委員，⁶⁸昭和17年(1942)擔任高雄興業信用組合理事，⁶⁹昭和18年(1943)擔任高雄造船所代表。

皇民化運動時期，由於戰爭的關係，各項物資受到國家統制，勞動力與艙位被徵用，除了燃料、棉絲、馬尼拉繩、鐵鋼材、橡膠等物資短缺外，船長、機械士被徵調，船隻亦被徵用，漁業用品、漁業用油價格日漸高漲，漁業用鹽、燃料不足，以及漁船、漁具、發動機等製造費用價格亦上漲，使得漁業經營生產日漸困難。⁷⁰根據後代

訪談，王石定的幾艘較大噸數之遠洋漁船曾被徵調，及至戰爭結束前後，王石定擔任高雄市漁會理事長，顯示其商業及人脈之經營手腕。

二次大戰末期，高雄港受到盟軍猛烈轟炸，致使戰後漁業復甦，特別是遠洋漁業，復甦尤為緩慢，王石定在生產端遭遇挫折，無法進行出海捕撈或是製造漁船，改為投資下游端的加工製造，即投資魚油製造、擔任協隆興行董事長。協隆興行原在日治時期《高雄市商工案內》記錄為陳朝農開設，⁷¹陳朝農是海產物商，與王石定、蔡文賓同為高雄市魚市場的魚商之一，而後王石定、蔡文賓投資事業，並在戰後擴大了經營規模。



圖7 當時的報刊邀請王石定(丸山定彦)發表關於高雄漁業的發展

圖片來源：〈高雄經濟人の語る臺灣の南進策：漁業家團體の進出 餘地あらしめて欲しい 丸山商行 丸山定彦氏談〉，《高雄新報》(1942年1月19日)，第2版。

67 「商業登記」(1944年9月10日)·〈昭和19年9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762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762a006。

68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第三版)》·頁377。

69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王石定 | 1919~1947〉。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5月9日。網址：https://www.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31。

70 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頁361。

71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頁268。

一、戰後的公共參與

戰後，由國民政府接管臺灣，王石定認為學習中國話相當重要，因此會與長女王麗雪一起學習，跟會說中國話的人練習口說。由於王家在當地是有聲望的人，王石定參與當地公共事務，在初期擔任高雄市第 11 區，即哨船頭湊町範圍的代理區長一職，⁷² 也任職高雄市漁會理事長等漁業相關職務。此外，由於王石定樂善好施，對人友善，當時李幫助牧師在籌措前金基督教堂的經費，王石定曾向李牧師提過，如果教會建堂募款後仍有不足的部分，由他支出所需費用。⁷³

民國 35 年（1946）3 月王石定獲得高雄市漁會的推選，當選為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持續為漁民爭取福利，以漁業商人身分擔任參議員，是高雄市政商重心人物之一。⁷⁴ 王石定在市議會期間，分配為建設小組，成員有駱榮金、龔遜霖、林本南、高再福、黃賜、蔣金聰、黃再德等人，⁷⁵ 提出應急速實現及廣大漁民相關議題，包括：食糧輸送運賃特別減輕案、請免除漁船停港碼頭費案、修築漁港復興漁業案，⁷⁶ 建議長官公署移設「海洋研究所」於高雄市。

高雄港口的海洋活動，在當時物資與建設仍需加強復甦的情況下，漁業船舶與活動更是停滯，關心漁業建設的議員們在動議上通過「請長官公署取消禁止百噸未滿船舶出省以鼓勵民族之海洋發展」的議決，由王石定、曾宗鏞、莊高都、黃再德等議員擔任起草委員。⁷⁷

王石定也提議修訂〈臺灣省漁船登記辦法〉中規定漁船總噸數「二十噸以上者」修改為「五十噸以上者」，並請農林處撤銷遠洋漁業僅限定省營業。另外，在民國 36 年（1947）2 月 26 日曾進行動議會議，通過市營漁業公司二隻漁船失蹤調查案之動議，由方錫洪、蕭華茗、邱道得、曾宗鏞、陳浴沂、莊高都、張媽意、王石定、蕭金聰、林瓊

72 〈高雄市各區及代理區長姓名表核復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典藏號：00315800006009。

73 許雪姬，〈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38-239。

74 王御風，〈近代台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306。

75 高雄市議會，〈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第二次會議記錄（1946）〉。

76 高雄市議會，〈議員提案 / 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1946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

77 高雄市議會，〈會議紀錄 / 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第五次會議記錄（1946 年 11 月 30 日）。

瑤等十名議員，組織委員會負責調查。⁷⁸

二、二二八事件後的凋零

昭和 20 年（1945）8 月 15 日，日本於太平洋戰爭失敗、投降，同年 10 月 25 日，蔣介石政權接收臺灣，由陳儀出任臺灣行政長官，不過政府當局對於臺灣的經營不佳，使得政治、經濟轉換不順利，造成動盪，加上裙帶關係的用人制度，與官僚、軍隊貪汙者情形嚴重，種種因素的積累之下，臺灣社會的不滿情緒日益強烈，民國 36 年（1947）2 月底，於臺北爆發了大規模衝突，即二二八事件，而後擴及全臺。

二二八事件期間，王石定居所的一樓辦公室，由原本的大門敞開、生意往來，轉變為緊閉門戶。當時仍有人往來，並告訴時任高雄市參議員的王石定，說湊町的船員想聯合起來反抗，可能會燒毀漁船，⁷⁹於是王石定曾加以勸阻。3 月 6 日當天，擔任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成員謝任，⁸⁰來王石定居所邀請其至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開會，與數十位市議員及市民代表等討論時局。不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 3 月 6 日中午過後，下令其所屬部隊對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等進行鎮壓。⁸¹部隊從高雄要塞出發後循萬壽路通往市區，沿途開槍掃射，及至市政府，造成王石定與其他與會人士，例如：市議員許秋綜、黃賜、律師陳金能等人，不幸身亡，⁸²而王石定的屍體，則由配有紅十字臂章的李幫助牧師，⁸³用人力板車抬回居所。另外，根據中油高雄儲油所之報告檔案，提到王石定於歸途中誤被擊斃殉職，在 3 月 27 日的中油報告中擬酌具賻儀悼念。⁸⁴

78 高雄市議會，〈會議紀錄／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47 年 2 月 26 日）。

79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42。

80 同上註，頁 240。

81 張守真，〈高雄市區「二二八事件（高雄三三事件）」與士紳救援工作〉，《高雄文獻》，7（3）（2017），頁 6-97。

82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196。

83 根據後代敘述，王石定的死因有兩種說法，一是西裝忘了拿而回頭去拿，二是西裝被圍籬鐵絲勾到，而王石定出門時打扮得體，穿著西裝、佩戴手錶與戒指，在遇難後，其身上西裝破爛、物件皆被剝去。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42。

84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台灣營業所高雄儲油所，〈為高雄漁會會長王石定誤被擊斃擬酌具賻儀可否〉，《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1947 年 3 月 2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13330000K/0036/1-19-2/1/1/065。

當時王石定居所二樓，曾借住給一位警員，⁸⁵是接收人員之一，初來臺時因沒有地方住，便住在王石定家中，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曾有軍隊至家中敲門，要將王氏一家帶到西子灣那裡的隧道，在警員的說情下得免於離家。王石定的離世，使得王家產業受到波折，除了對王石定的金錢往來不甚了解外，許多產業沒有即時接手管理，造成巨大損失。根據訪談後代，由於王石定的孩子尚且年幼，由妻子林淑媛繼續經營漁船公司，通常漁船每出海一趟回來後需進行更新與保養，花費甚多，因為不擅長經營漁業，使得出一趟船所賺得的金錢，仍不夠修船的費用，只能將漁船一艘艘賣出，而後結束漁船公司的經營。此外，王石定受到二二八波及而離世，不過後代在訪談中提到，林淑媛的姊姊是楊金虎的妻子，因此在王石定逝世後，王家仍有出資幫助楊金虎參與政治競選活動。

伍、結語

日本於明治 43 年（1910）將動力化漁船帶進臺灣，亦將日本的技術、資金帶入臺灣，而透過漁業移民，將動力漁船帶進高雄，哈瑪星成為日本人經營漁業的根據地，藉由成立高雄魚市株式會社管理魚市場，並透過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掌握漁貨銷售，使高雄市漁業發展與現代化國家同步，帶來哈瑪星的繁榮。

配合漁業政策發展，在築港計畫的同時，將高雄港建置現代化漁港，重新規劃、更新設備，提供動力漁船在給水、給油、給冰，以及魚貨卸賣、漁產加工等作業需求，高雄的遠洋漁業於 1930 年代至 1940 年得到長足發展，不論日本人或臺灣人，其漁業從業人員大多選擇居住在哈瑪星，而一開始日本人的漁業移民之外，也有部分臺灣人掌握了現代化漁業的發展契機，其中之一為王沃。

王沃於明治 37 年（1904）跟隨父親王水來到旗後街，從舢舨船載客的工作，到從事鮮魚的販售，其中的關鍵為日本人將先進的捕魚船隻與技術帶入臺灣，以及填築海埔

85 即尤世鎮先生。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41。

地造就哈瑪星市街。王沃擁有船隻，從帆船漁業到開始使用機械動力漁船，捕獲的漁獲量及種類增加，而打狗魚市場的設置讓鮮魚販售更是發展，王沃遂將事業的重心從旗後街轉移至湊町，居住在漁業從業人員、船長船員聚集的聚落，即湊町三丁目 25、26 番地之街廓，靠近船渠與魚市場。

王沃除了經營丸山商號外，也擔任高雄魚市株式會社董事，隨著動力漁船的使用與因應漁獲保存的需要，港口整建成具有現代化設備之漁業碼頭，王沃為發展遠洋漁業，參與高雄漁業協同組合，並投資高雄製冰株式會社。

王沃去世後，由王石定承繼事業，有捕撈漁獲、製冰、製造漁船之生產端，以及鮮魚販售的銷售端外，王石定開始觸及下游的加工製造端，即魚油製造。以生產鏈而言，上游的生產端以養殖漁業作為漁獲來源，中游維持鮮魚販售，下游則為加工製造魚相關之產品，成為王石定漁業事業模式。

戰後，王石定持續經營漁業事業版圖，並擔任參議員繼續為漁業及漁民爭取權益，不過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與蔓延，王石定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殞落，而後王家遺孀不諳公司經營而結束漁業事業，也使得本應為漁業發聲、乃至於在高雄漁業發展上有重大貢獻之人，其人生於民國 36 年（1947）戛然而止，直至民國 106 年（2017）5 月 4 日，高雄市文化局，以文資字第 10630519401 號，將經歷王沃、王石定事業興盛，以及受到二戰時期的波及與見證二二八事件之住所，列為歷史建築。⁸⁶

⁸⁶ 參閱國家文化記憶庫，〈漁業大王——王沃故居〉。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25 日。網址：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289067。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 專書

- 日高六太郎發行、作者不詳（1930），《高雄漁港とその陸上設備》。高雄：臺南新報社高雄印刷所。
- 王瑛曾（1958），《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臺北：遠流。
- 原幹次郎（1931），《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
- 高雄市役所（1937），《高雄市商工案内》。高雄：高雄市役所。
- 高雄州（1936），〈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收於高雄州產業調查會編，《高雄州產業調查會委員名簿》，頁349-356。高雄：高雄州。
- 臺灣水產會（1937），《臺灣に於ける動力付漁船々名録》。出版地不詳。
- 臺灣新民報社（1937），《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第三版）》。臺北：興南新聞社。
-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1912），《打狗築港》。臺北：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

(二) 檔案文件

- 〈高雄市各區及代理區長姓名表核復案〉（189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31580006009。
- 《重工業用地買收書類（戲獅甲、前鎮）》，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20.019.0080-0180、KH2020.019.0080-0182。
- 「商業登記」（1944年9月10日），〈昭和19年9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762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762a006。
- 「船舶登録（十一月）」（1939年12月22日），〈昭和14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765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765a006。
- 「船舶登録（三月）」（1940年5月5日），〈昭和15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87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877a007。
- 「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1897年8月1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
- 「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設立ニ付官有地拂下并官租地復舊工事設計及工事著手結了期間認可（社長安藤達二）」（1912年12月1日），〈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一三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24006，頁77-82。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台灣營業所高雄儲油所（1947年3月27日），〈為高雄漁會會長王石定誤被擊斃擬酌具賻儀可否〉，《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13330000K/0036/1-19-2/1/1/065。
- 高雄市議會，〈議員提案／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1946年7月23日至27日）。
- 高雄市議會，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第二次會議記錄（1946）。
- 高雄市議會，〈會議紀錄／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第五次會議記錄（1946年11月30日）。
- 高雄市議會，〈會議紀錄／民政〉，高雄市參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第二次會議記錄（1947年2月26日）。

(三) 報章雜誌

- 〈丸山隆沃氏〉（1943年8月25日），《高雄新報》日刊，第2版。
- 〈高雄經濟人の語る臺灣の南進策：漁業家團體の進出 餘地あらしめて欲しい 丸山商行 丸山定彦氏談〉（1942年1月19日），《高雄新報》，第2版。

《臺灣日日新報》（依時間順序排列）

〈打狗舢舨組合〉（1901年3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計設魚市〉（1912年4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魚市落成〉（1912年11月22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打狗魚市改善漁民之福音〉（1918年3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高雄魚市代行機關特殊會社の内容漁業者保護に意を用る關係業者の氣受は好い〉（1926年1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1版。

〈高雄魚市重役選任〉（1926年3月11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當面の急務たる高雄漁港設置問題（上）〉（1926年7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高雄市漁組籌設購組〉（1927年8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4版。

〈高雄港祭 盛況閉幕 有龍舟競渡等〉（1937年3月31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4版。

臺灣水產協會（1936）·〈彙報·高雄に於ける水產功勞者表彰〉·《臺灣水產協會雜誌》·252·頁33。

臺灣水產協會（1941）·〈彙報·臺灣水產輸移出入組合創立〉·《臺灣水產協會雜誌》·318·頁41。

二、專書

Pavel Ivanovich Ibis 著·江杰翰、吳進仁、劉柏賢、陳韻聿譯（2022）·《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國海軍保羅·伊比斯的臺灣調查》。新北：聯經。

王石鵬（1962）·《臺灣三字經》。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文環（2021）·《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2015）·《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臺中：好讀。

財團法人臺灣省台南社會教育基金會編（1995）·《認識南臺灣系列專題講座專輯（第二輯）》。臺南：臺灣省立台南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58）·《高雄市志港灣篇》。高雄：高雄市文獻會。

張守真（2000）·《旗津漁業風華》。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2006）·《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楊玉姿（2008）·《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劉克襄（2015）·《福爾摩沙大旅行》。臺北：玉山社。

鄭力軒（2014）·《重修屏東縣志：產業型態與經濟生活》。屏東：屏東縣政府。

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著·林金源、劉怡妤翻譯（2019）·《福爾摩沙拾遺：歐美的台灣初體驗 1622-1895》。臺北：經典雜誌。

三、期刊與會議論文

王御風（2011）·〈日治時期高雄造船工業發展初探〉·《高雄文獻》·2（1）·頁59-75。

胡興華（2014）·〈臺灣漁會的演變與發展〉·《檔案半年刊》·13（1）·頁4-19。

佐久間馨儀、吳佩儒·〈大坪與一翁小傳〉·《高雄文獻》·2（2）（2012）·頁173-181。

李文環（2016）·〈柯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40·頁21-44。

張守真（2017）·〈高雄市區「二二八事件（高雄三三事件）」與士紳救援工作〉·《高雄文獻》·7（3）·頁6-97。

黃于津（2020）·〈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高雄文獻》·10（2）·頁76-107。

關正宗（2002）·〈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古今論衡》·8·頁65-90。

四、學位論文

王御風（2006）·〈近代台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王淑珍（2014）。〈旗後舢舨船與地區發展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美純（2012）。〈打狗旗後地區漁業發展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昇璋（2017）。〈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五、檔案資料

戶籍資料：高雄市鼓山戶政事務所（鼓山區、鹽埕區、旗津區整併為鼓山戶政事務所）、屏東縣東港戶政事務所提供。
發行人不詳（年代不詳）。〈日治初期旗後街〉。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11.009.029。
謝惠民（1968）。〈1968年高雄港第一船渠〉。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2.008.080。

六、網路資料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王石定 | 1919~1947〉。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5月9日。網址：https://www.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31。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3月25日。網址：<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歷史沿革〉。資料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5日。網址：<https://www.kh3c.com.tw/kh3cintro/history.html>。
國家文化記憶庫，〈漁業大王——王沃故居〉。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3月25日。網址：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lace&id=289067。
漢珍數位圖書，《臺灣人物誌》。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5月9日。網址：<http://192.192.58.94:8080/whos2app/servlet/ShowService?&path=ftimg/&title=c98/9827901.pdf>。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